

· 报告文学集 ·

YI GE NU BING DE MENG

● 刘三省 著

一个女兵的梦



海潮出版社

· 报告文学集 ·

一个女兵的梦

刘三省 著

海潮出版社

一个女兵的梦

刘三省 著

*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编:100841)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66 千字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054-769-8/I·182

定价:15.00 元

曲径通幽处

——我的出书心态与创作体会

(代序言)

当这本报告文学集跟读者正式见面时，我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这是在经历一番权衡利弊、痛苦抉择之后心理上的彻底放松，也许是在“破釜沉舟”心理支配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反正书出了，该不该，由人们自由评说！

经不住好言相劝和再三鼓动，我终于
痛下决心，出本自己的文学集子

的确，这本报告文学集的面世，既是我多年苦苦跋涉、坚持业余创作的结果，也是在经历长期的犹豫、徘徊，终于在一帮文学笔友鼓动下，鼓足勇气所作出的抉择。

1978年，总后勤部机关急需从基层选调一批青年干部。我这个已在总后青藏兵站部司令部任职7年的训练参谋，有幸被选中，先是送总后襄樊干校青年干部培训队学习一年，尔后分到总后机关，在当时的总后工厂管理部政治处任政治干事。

高层机关，人才济济，我的周围多是从高等院校毕业的高才生。他们学识渊博，酷爱写作，加上从事政治工作

的需要，使我这个只上了两年初中、又来自基层部队的“粗人”，开始有机会写作。

一九八〇年，总后勤部老部长洪学智再次调回总后勤部主持工作。老部长上任后的主要决策之一，是对军队工厂管理体制做了重大调整，将原下放各军区管理的军需工厂收回总后勤部领导和管理。总后工厂管理部随之改名为军需生产部，并组建了政治部。我被分到组织处，与当时的段葆祥处长和蒙国东、严时宜同室办公。

段葆祥、蒙国东和严时宜是当时工厂管理部的高材生，大学文科毕业，擅长写一手漂亮、精美的文章。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项军是总后机关有名的“秀才”，长期参与总后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的起草工作。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在领导、同事的帮助下，我的写作水平逐步有所提高。

后来，部领导和政治部领导虽然几经更替，无论是张植臣、孙成如、孙承军部长，还是孙志超、张自力、邓耀辰、刘世方、王汉东主任，都酷爱人才，重视写作，积极支持有一技之长的同志从事业余创作，为爱好写作的我和我的同事刻苦进取、施展专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但是，真正促我走上业余创作道路的，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总后军需生产部党委确定召开军需生产系统“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为了搞好会议筹备，组织上确定组织一批人去工厂，总结拟受表彰单位与个人的先进事迹。好强上进的我，竟主动

请战，一人承担了9份典型材料的撰写工作。

部领导和政治部领导的最大特点是工作放手，只要你能干，就时不时给你压担子。

我不负众望，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加班加点搞材料，而且初战告捷。由我撰写的三六〇三厂厂长王世平的事迹材料，受到了部领导、政治部领导和周围同志的一致好评，并被作为范文供其他同志借鉴参考。

那时我年青，用不着当众表扬，几句鼓励话就会使我精神抖擞。我一鼓作气，一个月内相继完成了8份典型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被表彰大会全部采用。这对于我日后的写作和业余创作，无疑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表彰大会的成功召开，在总后机关造成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不久，总后政治部宣传部的王宗仁同志，受政治部领导的委托，找到军需生产部，打算组织一批有些写作能力的同志，依据军需生产战线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事迹，出一本报告文学集。

当时，政治部爱好业余创作的同志较多，大家共同为之高兴。我也被选定为作者之一。

一番紧锣密鼓的采访准备和连续挑灯夜战，我的处女作《在改革的大潮中——记军需生产系统劳动模范三六〇三工厂厂长王世平的改革事迹》出手了，经王宗仁同志稍加修改后，编入了《幽幽兰草情》这本报告文学集。

这是我第一次写报告文学，少功底，缺经验，从作品标题就可以看出没有多少文学色彩。但在那个时候，一篇处女作，能收入报告文学集，对于初次从事业余创作的

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与鞭策。

我至今感谢将我引上业余文学创作道路的王宗仁同志。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渐渐喜爱上了业余文学创作，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不管作品能否采用，我牺牲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埋着头，憋着劲，一个劲儿地写。有多少个节假日、星期日，别人合家欢聚，外出旅游，或上街采购，我却把时间、精力几乎都耗费在了业余创作上。人瘦了，心累了，可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激励着我，不管工作多忙，家务多重，我一直未曾打消业余写作的念头，放下沉甸甸的笔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作品终于被社会所承认，连续几篇被刊登在全国性文学刊物和大报的文学副刊上。

其间，对我影响和教益最深的有三个人：王宗仁、窦孝鹏、肖怡然。

王宗仁、窦孝鹏既是我的同乡（他们也是陕西扶风人），又是我业余创作的师长。他俩都是总后有名的作家，我对业余文学创作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他俩的影响。虽然他俩参军比我早10年，可他们平易近人、挚着敬业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他俩的影响下，尤其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我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使我的写作技巧逐渐有所长进。

肖怡然是个苦命人，一生坎坷曲折，唯一的爱好是写作。他虽然只有高小文化，可刻苦勤奋，好学肯钻，尤其是写起文章来，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正是在他的刻苦

勤奋和“拼命三郎”精神感召下，我克服了一道道难关，熬过了无数个夜晚，坚持把自己想写、要写的东西写出来，以此讴歌新时代的人物风貌、精神境界、人间温情和时代风尚。

当然，对我产生影响的，还有马继红、蒙国东、李来梓、欧阳祖照等人。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对文学创作的特殊感情和挚着的追求精神。

不久，王宗仁的《鲜花开在山那边》等几本文学集出版了，窦孝鹏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也问世了，马继红也出了几个集子。我从内心里羡慕他们，替他们高兴。

后来，与我长期保持联系的文学笔友——李来梓、欧阳祖照也陆续出版了自己的文学集。当时，他们也知道我有近20万字的作品，再三鼓动我出书。我虽然从心里有点按捺不住，可思考再三，未敢轻举妄动。

这与我的一些“敏感”问题上性格懦弱有关。

多少年来，在事关个人名利的问题上，我一惯顾虑重重，胆小怕事。也许是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特殊，也许是我自身民族心理文化沉淀太深，我深知“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木高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内中奥妙和道理。

记得在1985年6月，部机关在调整干部职务时，我在同年兵、同龄人中，第一个被提升为副团职干部。当时正赶上部队换装，凡是团以上干部，都可领到一套新式毛料军服。我也照例领到了一套。穿上这套做工考究、质地优

良的毛料军服，别提有多精神了。我心里有种按捺不住的高兴。

可是，由于心理上的障碍，我一直没有勇气穿出去。在同年兵、同龄人面前，我总有一种负疚感，好象我的职务晋升不是靠组织培养，靠自己实干，而是沾了同事的光，欠了他们的情。以致把领到手的毛料军服压在箱子里，一压就是三年。直到同年兵、同龄人都晋升到了团级职务，都穿上了毛料军服，我才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把那套毛料军服穿了出去。

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同年兵、同龄人都是胸怀若谷、宽宏大量和知书达理的人，他们一贯待我很好。可当时我思想顾虑太多，心理障碍太重，几番思想较量，就是没有勇气把毛料服穿出去。

在出书问题上，我又同样重蹈覆辙，没有勇气。总觉得周围有几百双眼睛在盯着我，怕因出书而招人议论，惹人生厌。

凭心而论，自己牺牲了大量的业余时间，辛辛苦苦、费心劳神写出的作品，既非剽窃之物，更非抄袭他人，如果能奉送读者，也算是对社会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但是，无论他人怎样说服、鼓动，我就是鼓不起这个勇气，下不了这个决心。尤其是1992年我被提升为总后生产管理部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后，上述心理就更甚。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默默无闻干事，夹着尾巴做人。若当官，别图名。

有人说，你的观念太陈腐了。我不置可否。

1994年8月份的一件事，促使我放弃了上述念头。

当时，我从深圳参加了两个多月的特区军队生产经营清理整顿，回北京作短暂休整。有天晚上，我的笔友肖怡然给我送来他新出的报告文学集《人生旅途四十八》，作品篇幅很大，约30万字。这实在让我有些吃惊，他原有近20万字的作品，一年不见，作品竟如此丰厚。

我问肖怡然：你出书就不怕人议论，说你图名图利。

肖怡然嘿嘿一笑：怎么不怕，当初我也犹豫过一段时间。可人总不能为别人而活着，看他人的脸色行事。走得端，行得正，你怕什么！

没想到，肖怡然在这问题上，竟如此刚毅果敢。

我又问：周围人反应怎么样？

肖怡然满面笑容地说：出乎意料，周围人反映很平静。西北物资局的领导还在机关大会上表扬了我。尤其是工厂，反映蛮不错哩！

他反过来问我：你有何打算？

我说：无打算。

肖怡然说：你这个人心理负担太重，活得太累。出本书，不招人，不惹人，怕什么。照这样下去，你老不死，也得累死！

仔细想想，肖怡然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回到深圳，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与我同在深圳参加清理整顿的陈松林。陈松林虎气生生地说：我早就劝过你，可你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还是那句话，大胆出。

经不住朋友们的好言相劝和再三鼓动，我终于痛下决心，出本自己的文学集子。

**《三个女劳模的苦恼》发表，
使我领悟到了业余文学创作如何
选择题材和把握社会主题**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紧扣社会主题，讴歌时代楷模，宏扬时代精神，鞭挞人间丑恶，是文学创作的真谛和生命所在。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路半路出家的初学者、小学生来说，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会运作，而是在经历了无数曲折和探索，才逐步领悟到这一点的。

在我对文学创作发生兴趣的时候，正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那时候，我尚未学会选题，在题材选择和作品主题的把握上，尤如闯入春意盎然、百花盛开的百花园中的一只蜜蜂，被一朵朵、一束束争奇斗艳、五彩缤纷的花蕾搞得眼花缭乱，什么都想写，什么都涉猎。结果，摸不到时代脉搏，扣不住社会主题，多数都失败了。在选题上，雷同化和大而化之的东西多，缺乏独辟蹊径，从活生生、鲜灵灵，又平淡无奇、纷呈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去感知、领悟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社会主题。结果，写出的作品大多缺乏新意，思想性比较平淡。连续几次投稿，都石沉大海。

为此，我痛苦过，彷徨过。一度想就此搁笔，退避三舍，永不涉足业余文学创作。

正当我在业余创作的崎岖小径上苦苦跋涉，深感出师无望的时候，一次偶然的创作冲动和随后作品的发表问世，使我顿开茅塞，初次感知和领悟到从事业余文学创

作的一些“奥秘”。

1988年4月25日,《工人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扶正必须压邪》的文章。文章详细地披露了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临汾市金属结构厂厂长师回喜自当劳模后,屡次遭受诬告、陷害的悲惨遭遇。

这篇报导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并勾起了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1986年,我在筹备召开军需生产系统“双文明”表彰大会时,曾负责几位劳动模范的采访和事迹材料的整理。采访中,我发现当劳模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件轻松和值得庆幸的事。论工作,这些人没挑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的三年干了五年的活。

从对于一个劳模人生价值的肯定方面讲,他们应该受到表彰。可当了劳模,是非太多。白眼相待,讽刺挖苦,简直成了一些心眼小、爱挑剔的人对待劳模人物的惯用手段。

为此,他们苦闷,他们彷徨,他们在苦苦思索,自己究竟该不该当这个劳模。有的甚至向我提出:给领导说说情,别让我当这个劳模了。人累不死,会被闲言碎语淹死!

表彰大会结束之后,军需生产部又组成两个劳模报告团,分赴全国各地的军需工厂作巡回报告。组织上指定由我担任报告二团的团长,负责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军需工厂的巡回报告。在此期间,我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和了解劳模。言谈中,参加巡回报告的几位劳模,几乎与我采访的几位劳模有同样的经历和心理。他们不愿出名,也不

愿参加巡回报告。有的反映，就是因为参加了劳模报告团，车间竟背着工厂，把他们的奖金都扣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国家里，当劳模真是太难了！

我在想，《工人日报》所披露的全国劳动模范师回喜的遭遇，能在我心理上引起震撼，也一定会在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当中引起震撼。既然劳模们都有同样的境遇和心理，都活得不轻松，我何不抓住这一题材，把过去采访过的几位劳模的苦闷心态，以报告文学形式写出来，以此呼吁社会，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去更多地理解劳模，尊重劳模，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的价值？！

我预感到，这篇作品写好了，有望发表。

说干就干。我找到了当时下厂采访的笔记，经过一番思考、准备，利用了几个晚上，匆匆写就了《劳模的困惑》这篇报告文学。

当时，《报告文学》刊物办得正火，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拥有30多万读者。我决定把稿子寄给《报告文学》编辑部。

稿子发出半个月，没有动静。一个月了，仍没反应。我估摸，准是文笔粗疏，又“泡汤”了。

正当我心灰意冷、大失所望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报告文学》编辑部的电话，约我去谈谈稿件的修改问题。

我欣喜若狂。约我谈稿子，说明作品发表有望。

当时，我正在呼家楼参加一个座谈会。插了个空，抓了台车，直奔北京东四《报告文学》编辑部。

接待我的是《报告文学》主编、著名作家傅溪鹏。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内心感情十分丰富，可外部表情有些僵硬甚至冷漠。他不冷不热的同我谈话，既使我受宠若惊，又局促不安。

傅主编首先肯定了我的作品选材好，有思想性，读后发人深省，耐人寻味。而且，《报告文学》从未发表过此类题材的作品。他要求我对每个劳模人物的表述角度适当作些调整，加重文学色彩。修改后，由《报告文学》正式发表。

当时，别提我有多高兴了。

会议结束后，由于去外地出差，一直腾不出手修改。一个半月后回到北京，才抽出几个晚上，调整了框架、思路和人物表述的层次、角度。同时，临时阅读了几篇侧重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报告文学。然后，才动笔修改。改好后，我有意放了一段时间，回头再看、再改，直到满意后，才正式送给了《报告文学》编辑部。

也许是修改中下了些功夫，也许是编辑部对这篇稿子偏爱。傅主编和李正堂编辑在审阅了我的修改稿后，比较满意，只是觉得人物多了一些，提出拿掉一个男劳模和一个女劳模，保留三个女劳模。

对作者来说，主编、编辑无疑就是“上帝”，对他们的话，必须言听计从。我当即表示同意。

1989年6月，我的作品被《报告文学》正式刊用。只是标题作了修改，将《劳模的困惑》改为《三个女劳模的苦恼》，内容、情节基本未动。

改成《三个女劳模的苦恼》，编辑部自有他的考虑。尤其是青年读者，对女性题材比较敏感，把“劳模”换成“女劳模”，自然更能招揽读者。

应该说，这篇作品的创作是成功的，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作品先是被新华社《文摘报》改写成“故事梗概”，介绍给广大读者。不久，浙江和贵州《每周文摘》等也原文刊登了作品全文。与此同时，我还收到了经《报告文学》编辑部转来的10多份关心作品中劳模命运的读者来信。

这篇作品的发表，对我以后的业余文学创作是一个重大转折。再写报告文学或小说，我不再盲目，而是注意紧扣社会主题，写一些反映时代精神，挖掘社会和民众所关心、重视，并能唤起民众良知和同情心、正义感的题材。

在题材选择和社会主题的提炼上，我开始有所领悟并逐步上路了。

文学界出现的“社会问题”

热，使我转移视觉，开始研究一些带宏观性、

全局性的社会问题

自古以来，凡大器有成的文人墨客，无不告诫弟子或后人：文学不可远离生活，但要远离政治。

其实，这只是说说而已。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脱离社会、脱离政治吗？问题的关键是要摆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创作必须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其中包括对社会、对政治有待完善的方面提出善

意的批评,但不能干预政治。

从1988年开始,在报告文学创作上,一度出现了“社会问题”热。作者们把文学的触角,由着重对人物、事件的描写,开始转向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大到人口控制、环境污染、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小到体育、文艺和教育改革等,作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用文学手法,依据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发表各自的看法。

凭心而论,当时有不少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尤其是以土地、人口、水源和教育体制改革为题材的作品,就其出发点和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不错的。

受一些有见地、有思想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影响,我也试图通过报告文学形式,对一些涉及全局和宏观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艺术化、形象化的研究和探索。

当时,我在军需生产部政治部负责组织、宣传工作,接触最多、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问题。

1988年2月,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这一全国最有权威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团体,在第四届年会上正式提出,要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并得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肯定。

所谓“新体制”的初步构想,是指打破常规,建立一种“以厂长为领导,以行政干部为主体,以政工干部为骨干,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基础,以工会、共青团组织为纽带,以党组织为保证的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

这种构想的提出,是以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为背景的。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搞厂长负责制,厂长就不仅仅要管生产、管经营,理所当然地也要管思想政治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种构想不是一点没有道理。

问题在于,它违反了“社会分工”的基本原则。动员厂长和行政干部管思想工作,那还要党委书记和专职党务、政工干部做什么?

这一构想的提出,一开始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反对。政工干部的抵触情绪自然更大些。

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既然上面定了,理解不理解,行通行不通,都须执行。

就这样,一种缺乏科学论证、缺乏群众基础的新体制,在人们缺乏理智思考的朦朦胧胧之中正式出台了。

1989年初,总政治部准备召开新形势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总后政治部要求军需生产部政治部准备几篇有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调查报告或论文。经政治部领导研究,这件事落在了我的身上。

为了拿出几篇有事实、有根据、有情况、有分析、有见地、有建议的高品位论文,我带着任务,跑遍了石家庄、邯郸和承德地区10多个军需工厂。

大量的事实表明,这一新体制,不仅没有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起色与活力,反而造成行政、政工人员思维和行为方式的错位,出现了行政与政工人员“互种他人田,荒了自家地”的局面。

一方面,行政人员负担过重,疲于应付。另一方面,政